

● 书 评

征实而敏锐 沉潜而致新

——《魏晋南北朝诗学》读后

黄 南 珊

[作者简介] 黄南珊(1948-),男,湖北鄂州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I 207.22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1-0126-03

在新世纪行进的学术建设中,中国古典诗学研究推出了一批新成果。其中引人瞩目的学术力作,是陈顺智教授的新著《魏晋南北朝诗学》。陈著征实而敏锐,沉潜而致新,从学术思路到研究方法,从思维方式到表述方式,都体现出自己鲜明的学术特色。

一、史论一体的结构框架

学术著作的整体结构设计,可以从一个维度见出著者思路考较的深衷和学理建构的匠心。陈著在整体结构框架设计上,突破了以往中国诗学史著作那种通史性的传统结构套路和叙述范式,把六朝诗学问题置于史论一体的纵横坐标上,把历时性纵向通观描述与共时性横向论理解析融合起来,俾使对六朝诗学形成历史维度与美学维度的整合性阐释。该书总共四章可分为两大板块。一是六朝诗学发展史,从“史”的纵向视界对六朝诗学的发展轨迹和历史演变作宏观性勾勒和整体性概括。它把六朝诗学发展史分为三个重要阶段,即建安正始时期、两晋刘宋时期和齐梁陈时期。关于第一阶段分析,突出了诗学由注重政治教化功能向崇尚抒情娱乐功能的转向,把审美作为最根本的价值标准,这是六朝诗学理论发展的逻辑起点。关于第二阶段分析,突出了陆机“缘情绮靡”的崭新诗学标帜,指明其别开抒情求美理论流派在中国诗学史上的重大意义。关于第三阶段分析,突出了诗学理论的新变,指出其自觉地从诗歌内部来探究艺术审美特征,并对当时四个诗学派别进行了详明切实的评析。著者还对每一阶段重要诗论家及其论著(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进行了重点评析,阐释其各具特色的诗论观点及其对于诗美学的贡献。这样,就对六朝各时段诗论发展的脉络与流别、传承与变异、倾向和特色进行了剖切精当的剖析,清晰地展现了六朝诗学注重情感抒发的精神特质和追求艺术美感的美学标向。

二是六朝诗学形态论,从“论”的横向视界对六朝诗学重要形态进行了专题研究。在“本体论”中,著者透析了玄学本体论的价值意义及其对诗学独立的重大促进作用,指明它的出现为六朝诗学理论的突变及诗学本体论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在“主体论”中,则着重探讨了个性论和性情论的内涵和特征,注重情感发抒与美感享受的关系及作家个性与诗艺风格的联系。在“主客体论”中,则在感物说的基础上阐明触物融情、入兴贵闲、意象营构分别为主客体交融的基本方式、心理机制和艺术结晶。在“形式论”中则对“语言论”、“声律论”、“对偶论”和“典故论”分别加以切要地论析。并由此指明,六朝诗学形式话语建构高扬了诗歌的内在审美价值和追求多样艺术美;其最大贡献在于对诗歌形式之美的多维探索和有效开发,其深层动因在于当时强大的时代审美思潮,其积极结果是对中国诗歌形式美学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石(第181-182页)。这样,就对六朝诗学理论的机制与形态、结构与功能、规范与特征进行了精当的条分缕析,特别是突出了性情和形式两个诗论关节点和把捉到其趋向情感与美感相统一的根本特色。

陈著史论一体的结构框架,使发展史与形态论互渗互补,研治的通识与覃思相须相得,体现出宏通的历史发展眼光和新锐的理论思维活力的统一,既对六朝诗学发展概况作全景式鸟瞰,又对主要理论问题作细致深入探讨,使读者获得了全息性把握和深邃性理解。

二、高屋建瓴的本体视界

基于六朝诗学的诗性思维与玄学的哲学思维的内在关联性,陈著从本体论视界对六朝诗学进行了深度阐释。关于玄学对六朝诗歌创作的影响,著者曾在其专著《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中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而关于玄学本体论对六朝诗学理论的影响,著者则在新著中作了精微的探究。陈著明确指出:玄学作为思辨性极强的思想体系,为六朝诗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思维方式;玄学作为玄解心悟的思想方法(玄心),为诗歌创作理论提供了一种超迈的审美“诗心”和开辟了玄远的艺术境界。在“本体论”中著者精辟指出,玄学使人从本体论视界观照诗学理论而确立诗歌本体论。首先,诗学本体论的确立,引导人们自觉探索诗歌的共同本质属性,对诗学理论发展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诗学本体论视道文关系、情文关系为本末体用关系,整个文学的本体是道,单篇作品的本体是性情(第134页)。在著者看来,曹丕的文学“本同”论,陆机的“缘情”为本论,挚虞的“情志为本”论,刘勰的“情文”论,这些情本论是以道本论为坚实基础的,获得了本体论的品格,有力推动了诗学走向独立自足。其次,玄学的审美人生态度和思辨性思想方法,强化和深化了趋新求美的审美思维和辨异别殊的求异思维。它引导人们去辨析诗歌自身的异质因素,去探究诗歌的内部规律,去发掘诗歌不同的风格流派,去研究诗歌不同体式的演化过程、发展规律等(第146页)。如关于文体之辨、文质之辨、创作风格之辨;关于创作构思、艺术想象、艺术意象问题的深层思考;关于语言、声律、对偶、典故等形式美建构的多维探索。这种缜密精致的思想方法和深入细致的理论探索最终导致诗论从文论中走向独立和发展。

陈著认为,诗学本体论的确立,为诗学主体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确立了思维方向。从本体论角度来看,性情是单篇作品的本体;从主体论来看,性情是诗歌创作、表现的主体,因而性情既获得了本体性意义的品格,又具有主体性意义的基质,性情论就出入于而联通于本体论和主体论。从性情论来看,著者明确指出,六朝是主体意识不断强化和审美意识大发扬的时代,掀起了势不可挡的尚情重情社会思潮。这种思潮具体表现为,一是家庭人伦关系中从以礼法为尊尚转向以情感为旨归;二是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表现了丰富而深刻的情感;三是在对山水自然感悟中使人情之美与自然之美相通映照。这种重情思想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情真、情深、情细、情广,进入到情感至美境界(第158—162页)。正因性情论以玄学的本体论为基础和以其审美人生态度为依托,所以使个体主体的精神价值和诗艺的美学价值得到充分地挖掘和展现。

陈著观照的本体论视界使其能站在哲学制高点上对六朝诗学的核心问题加以举重若轻的审视和分肌擘理的论析,并指明它一是使诗学对外逐渐摆脱汉代经学诠释模式和政治教化功能观的束缚而趋向独立自足,二是使诗学向内发掘自身审美机制而走向发展和成熟。这样,本体视界使其探幽烛微而把握到枢纽肯綮,使其剖毫析厘而具有深邃性透辟性特征,因而与同类著作相比高出一筹而难能可贵。

三、新人耳目的理论创获

学术研究贵在有新开掘、新识见、新创获。陈著的创新思维和理论创获,主要表现为结构框架的新颖构建、观照视角的哲理提升和具体观点的创变致新。关于结构框架的新颖构建,于史论一体中纵横推究突现出思路更变而强化了构思出新;关于观照视角的哲理提升,于本体视界中提挈论题突现出析理透辟而强化了理论深度。这两方面上文已有论析,在此不赘。

关于具体观点的创变致新,可举其四声本于四象说为例加以评述。声律问题是六朝诗学形式论中较为复杂的问题。对于诗歌四声的发生与发现,自陈寅恪在《四声三问》中提出佛经转读说,被奉为诗歌声律论起源的不刊之论,著者对此权威论断提出三点质疑,并确立了内向探寻的思路,即主张汉语声律发现的内在动因应从汉文化本身去寻找。著者捕捉到,沈约在《四声谱》中从四方观念入手来理解四声;又在《答甄公论》中论述以四象、四时配四声的观点,“但能作诗,无四声之患,则同诸四象”。这就用类比思维论证四声之立是以四象之论为理论基础的。沈约用四象、四时配四声的思路,接触到四声、四时、四方与四象的潜在同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中存在着以四象为核心的四象模式,强调四象(木火金水)、四方(东南西北)、四时(春夏秋冬)、四声(平上去入)相互对应而异类同构。由此可见,四声之说源于四象文化

模式。著者论析有破有立,既对陈寅恪的佛经转读说从材料和逻辑上提出质疑,显示出可贵的胆识和功力,又提出四声源于四象文化模式说,考论结合,有据有理,是富于新意的创见。陈著探幽阐微新见迭出,诸如玄学本体论不仅为六朝诗学主体论的确立奠定了思维基础,而且为感物说提供了理论依据;玄学清谈注重辞藻华美与辨谈技巧,有效促进诗歌讲求辞采之美;典故的产生与当时文化贵族化有着极为密切关系,典故的运用受到了贵族审美趣味的深刻影响,等等。这些具体的新论断,充分表现出著者睿智的美学眼光和精湛的理论识见。

陈著的理论创获还表现为独到的批评眼光和理论特识,即如以专节来发掘陶渊明的诗学精神。在两晋诗学中,诗人陶渊明不以理论著称,因此一般诗学史著作不注意其诗学理论贡献。著者慧眼独具,从陶渊明独绝千古的诗歌创作中发掘其诗学建树,总括为两点:一是变传统的道德教化、政治功利创作观念为娱情称心的创作态度。陶渊明追求自适自娱的审美人生境界,把玄学清尚自然的人生哲学与自己乐志称情的创作态度统一起来。陶之独具的质性自然的气质性情、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和超尘拔俗的人格精神,铸就其独特个性,使其诗歌抒情个性化达到了历史新水平。二是造出一种真朴淡远的艺术境界和冲虚和雅的美学风格。陶渊明淡泊自然的人生观和清旷高逸的人格风范,最终铸就其萧散冲淡的诗歌风格和平淡简远的诗艺意境而显示出特异性,即高标了于农业文明背景下实现个体自由本质的人生诗化方式。这就精辟地揭示出陶渊明生命存在方式与艺术创造方式的关系和主体精神特质与诗艺创造特色的关系,由此而抉发出其特异的诗学精神。由上可见,著者把诗性思维和创造思维融合起来而致力于理论创新,在深层开掘中增添了学术亮色。

四、多样综合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构成学术研究的功能性维度而与研究思路、研究视野、研究材料、学术识见实体性维度融合一体。陈著比较重视方法论变革问题,在以现代诗学眼光对六朝诗学进行观照和研治时,将传统研究方法与现代科学方法结合起来,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宏观审视与微观分析相统一、理论思辨与实证分析相统一的方法加以综合运用,并贯彻到整个研究之中。

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著者还运用文化探原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使其专题探讨获得了新拓展进入了新层次。如在“声律论”分析中,从艺术形式美感追索到文化深层底蕴。其四声本于四象模式说,就是从文化探原法角度加以追踪溯源而获得的。诗歌四声说的理论基础和依据深深植根于本土文化结构的深层。著者则沉潜深究直探本原,以确凿材料和严密论证确证诗歌四声本源于四象文化模式。再如在“对偶论”分析中,著者探究诗歌对偶形式美产生原因而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偶思维形式。思维形式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核心层面。著者究源竟委地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偶思维的产生原因、表现形态和基本特征,并指明对偶思维是形成诗歌语言对偶形式的前提性条件。又如在“典故论”分析中,谈到典故的产生和运用时追索到两种传统文化情结,一是崇古尚古的文化心态,二是尊经重史的文化传统。崇古情结、经典情结和史乘情结作为汉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对诗学的诗性思维和美学取向产生了潜在性影响。可见,著者运用文化探原法从形式美意念追溯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发掘两者的深远内在联系,进窥诗学的文化深层奥秘,因而使理论分析具有一种深邃性和厚重感。

运用现代统计分析方法,可以补救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著者对于钟嵘《诗品》分析就有效地运用了这一方法。《诗品》以三品评诗人,陈著则对三品各占总数比例、各品的时代分布、诗人时代的百分比进行了数据统计,透露出其推重楚辞系的基本倾向。《诗品》以三系论风格,陈著则对诗人风格的传承流别和基本特征及同一风格的发展变异作了统计分析。先后分别具列了各系所占比重量,各朝诗人所占比重量,三系诗人各占品次比例数,以及国风 and 楚辞两系诗人各代变化情况数字,通过这种数据信息方阵,直观而清晰地显现垂直的风格传承流变和横向的风格交叉影响。著者由此得出结论:国风系由典雅深婉为主发展到建安时形成骨气高迈与辞采典雅合一,楚辞系则由情怨文绮主导特质发生分化变异加速,正好反映了时代的诗歌风气与审美趣味的变化,这种变化标示诗歌创作由古诗时代迈进了近体诗时代(第 106 页)。统计分析法使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不仅体现了著者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而且使其研究结论增添了可信度和说服力。由上可见,著者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使其研究在拓展和深化中展现出新的学术风景线。

总体说来,陈著视野开阔思路新致,“史”的通识和“论”的深思浑融无间,原典阐释与理论创造整合一体,思理严谨而风神洒脱,论析精深而笔调酣畅,会通熔铸而创变出新,集中显示了自己的学术特色。其美中不足之处在于,某些章节篇幅不够平衡(如“形式论”章节篇幅相对较少),有的新命题点到即止未能深入展开(如永明声律形成与民间音乐关系问题)。相比较而言,陈著对于六朝诗学研究能推陈出新有所突破,在同类著作中以高视点、新思路和新开掘见长,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意义。